

中国文学史品读

【鲍鹏山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I209.2/12

2007

中国文学史品读

鲍鹏山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品读/鲍鹏山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309-05696-9

I. 中… II. 鲍… III. 古典文学-文学史-中国 IV. 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4656 号

中国文学史品读

鲍鹏山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371 千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 100

书号 ISBN 978-7-309-05696-9/I·404

定价 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 余恕诚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的民族,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华民族所代表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录这个民族几千年喜怒哀乐、体现这个民族几千年艺术才华的中国文学,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面对世界、面对自己命运时的表情;可以看到这个民族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对自身道德人生、道德实践的观照和剖析;对人性缺点与优点的揄扬。在中国文学史中,不仅有对“实有”的生活及世界的或依恋或批判,还有对“应有”的生活与世界的向往与想象。在中国文学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民族对美好世界和完美人性的不懈追求。

由此,对这样的文学史作出描述和阐释,是一桩文化的大事业。而到这样的蕴含人类丰富情感的矿藏中开掘与炼取,找到对当代心灵的慰藉,更一直是一项充满诱惑的工作。同时,也是当代学者的责任。

通行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主要是作为教材来编写的。一般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从对文学流派及作家、作品的阐释切入,以知识的灌输与认知作为基本落点。这样的文学史,往往体现出强烈的传承文化的责任心,并以态度严肃、立场客观、立论科学、知识准确为自己坚定的学术追求。学术性强,理性精神突出,是其共同特点。

但是,文学史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而且,也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写法,才可以展示文学史的不同侧面,勾勒出文学史的不同面貌,展示文学的多重魅力。实际上,作为描述文学现象,揭示作家内心世界,感悟作品艺术魅力的文学史,学

术化的写法,在巨大的优点的背后,也有着明显的不足:过度的学术化,在揭示文学事实的同时,往往又遮蔽了文学自身的美丽;在冷静客观的学术化表达语境里,鲜活的文学自身却往往被遗弃在一边。作为认知与研究的功能突出了,而作为欣赏与感受的功能却退化了。而能否保持并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能否被文学作品感动,才是一个人的艺术鉴赏能力的天然尺度。同样,能否有助于帮助一般读者感受文学作品,提高他们文学感受的敏锐性,至少是文学史的责任之一。

另一方面,要真正实现对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深度阐释并揭示其当代价值或普世价值,必须有思想的介入。这不仅仅因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语),而且,还因为,在历史学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只有思想才能在历史中发现思想。因为,如果没有思想的光芒的照耀,很多被学术充分而准确地揭示出的“文学事实”里,其中的价值,也仍将隐藏在字里行间,不能被我们发现。因为,“价值”,往往是一种无形的存在,甚至,只在我们的阐释中存在。

鲍鹏山的这本《中国文学史品读》,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及价值,即是,一、体现了文学史的感性化特征;二、体现了历史学的思想性特征。

实际上,这不是一本体系性很强的文学史著作,严格地讲,它更像是一本文学史札记。但是,这五十多篇表达生动、新见迭出的札记,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史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及流派。所以,已经足以架构一个文学史的框架。况且,这本文学史的结构,本来就不重线的勾勒,而重在点的描述与深度阐释。

鲍鹏山二十多年前在大学时即听我的课,这本书中的关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文章,就是那个时候写就的,算是本书中最早的篇章。二十多年过后,他又回母校,跟我攻读博士学位。其间的二十多年,他在高校任教,埋头学问,并出版过不少著作。现在,他的这本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品读》即将出版,读完书稿,我非常高兴。先睹为快之后,特写了以上这些话,奉献给读者。

2007年6月7日于安徽师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序二

● 骆玉明

在中国,文学史类型著作的繁盛,大概是其他国度难以比拟的。或许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有关,但另有些很实在的原因:中国文学经历的过程十分漫长,产生的作品数量极其庞大,用历史的线索来描述它的大概面目与发展变化,依照时间序列来了解和记忆作家与作品的情况,从掌握知识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最为方便的方法。

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是以教材模式编撰的,即便有些书在写作时并未以充当教材为目标,但因为那一种模式流行甚广,成了习惯,也难免受其影响。于是,文学史著作常常会出现相似的毛病:一是照顾的面太广,有些基本的知识总是非讲不可,像一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呀,一个作家的主要生活经历呀;在篇章的分配上,名家名作固然占据大头,但二三流的也不好简单省略,哪怕蜻蜓点水,也要带上几笔。就怕知识不全面,读者应该知道的东西书里没有说。二是个性不突出,陈陈相因的内容太多。这当然可以指责作者的学力有问题,缺乏创见,但由于是教材模式而追求平稳,也是原因之一。我自己编过文学史,对此深有体会。有时,明明有一种特别的念头,在课堂上也讲过,写到书里就不免犹豫,怕调子奇怪,使用的人不容易理解和接受。

我们现在读到的鲍鹏山的这部书,可以说较好地避免了上面所说的文学史著作的常见毛病。它是不是也可以当教材使用暂且不论,作者没有按常规的教材模式来编写则是显而易见的。全书五十一个专题,既不按朝代也不按文学潮流加以分期,只是大略地依照时间顺序,挑出作者心目中最为杰出的作家与作品加以介

绍和论析,而自然而然形成具有“史”的意味的流动。就好像在一大堆成色各异的珍珠中挑出了最漂亮的珠子贯穿成链,显得简洁而好看。

由于较一般文学史著作省略了许多内容,知识的“点”不那么密集,本书对于作品的解析就能做得相对充分一些。譬如《道德文章》一篇,选取了《孟子》书中的若干富有特色的章节,依着文脉逐层解析,论其思想主张,情感的表现,辩说的手段,逻辑上的得失,最后勾画出孟子为人的基本品格,读来觉得明白、可信且亲切,普通的文学史很难这样做。当然,这也不是篇幅稍为充裕一些就能做到的,这书总体规模不大,篇幅还是受限制的,能抓住要点,舍弃枝节,才能说得这般透彻。

写文学史要有见识,同时也要敢于坚持己见,这样才能显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譬如关于“历史上有无屈原”的争论,鲍鹏山是这样说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屈原”,乃是一个“人文事实”。不管历史上——实际上也就是在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这个人物是谁,或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但至少从汉代贾谊、刘安开始,这“屈原”两个字就已作为一个“人文”符号而存在,并在不久得到了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认可,并为之作传。在贾谊、刘安和司马迁那里,“屈原”代表的是一种命运,一种精神,一种品性,这些东西让他们起了共鸣。而这些东西是抽象的,也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抽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那个已经消亡的肉体。自那时起,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就有了“这个人”,并且“这个人”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施加了他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人”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他的“抽象”意义越来越丰富,而成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人文事实”。

由于屈原被推崇为某种伟大精神的代表,许多人认为他在历史上必定具有如其指认的那样的真实性,否则的话,他所代表的那种伟大精神就不真实了。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任何“伟大精神”都代表了当下的价值,人们以此阐释历史,使“历史”成为“当下”的证明。阐释固然依据了历史提供的材料,但对这类材料的选择、推衍乃至注入新义,却是阐释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因如此,西汉以来历代文人依据同样材料所理解的屈原和他们描绘出来的屈原形象,往往面目各异。至于把“爱国”和“主张改革”作为屈原作品的核心精神,又是到了近现代才提出来的看法。而历史上的屈原(如果实有其人的话)究竟是什么样的,由于留存的史料不仅简略而且不尽可信,其实已经很难追究明白了。由于屈原的问题也像岳飞一样,牵涉太大且十分敏感,作为教材模式的文学史有时不得不迁就“共识”。但鲍鹏山却不管这个规矩,只管把他的想法写出来。他以“人文事实”这一概念来解释

屈原在历史中的存在,在我所见过的论著中,我以为这是说得最妥当的。

通常说来,文学史研究亦如一般学术,重理性而轻感情。这有它的道理。但另一方面,文学本来就是情感的艺术形态,如果没有情感上的沟通、共鸣,又怎么能够激发封存于文字中的活的生命呢?没有情感的阅读,文字永远是死的。鲍鹏山是一个感情热烈的人,于人于事尚无爱憎,便几乎不能有所言。以前他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评说古贤的文章,就是以个性化的见解和热烈的情感引人注目,如今他写文学史,依然故我,无从改变。“这样的诗,真令我们心花怒放。这是一种彻底的享乐主义,享乐得如此心安理得,如此张扬而大放厥辞,不仅自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而且对别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这是在说李白《襄阳歌》。我们读到了李白的快乐与“大放厥辞”,也读到了鲍鹏山的快乐与“大放厥辞”。情感的特点是自以为是,它会不会影响评述的精确性呢?我想鲍鹏山会考虑到这一点。但纵使有所逸出,也不算是大不了的罪过吧。读者通过鲍鹏山的介绍与古人交友,见他说得如此动人,兴致也会跟着起来,这是开心的事情。

文学史是不是写成鲍鹏山这样的才算好?我没有那样的意思。我只是说,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史,跟常见的很不相同,而文学史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面貌。因为我同鲍鹏山有长久的交情,不合适多加赞扬,所以主要是讲这部书的特色。

目 录

001/ 余序

001/ 骆序

001/ 一个民族的情怀 ●《诗经》

006/ 历史何以成为散文(上) ●《左传》

013/ 历史何以成为散文(下) ●《战国策》

018/ 道德文章 ●《孟子》

025/ 激情与超脱 ●《庄子》

030/ 面向风雨的歌者 ●屈原

040/ 言语侍从与御用文学 ●司马相如

045/ 汉代的冷幽默文学 ●东方朔与扬雄

050/ 听那历史的哭声 ●《史记》

056/ 死亡与爱情 ●《古诗十九首》

064/ 大地的歌声 ●汉乐府

073/ 文学的大纛 ●建安文学

080/ 生存还是死亡 ●阮籍与嵇康

088/ 良心何在 ●西晋文学

098/ 南山种豆 ●陶渊明

111/ 没安好心 ●谢灵运

119/ 迷者之歌 ●鲍照

124/ 南方和北方的女人 ●南北朝乐府民歌

131/ 感伤的青春 ●初唐诗歌

138/ 张若虚的夜晚 ●《春江花月夜》

目

录

001

- 146/ 谁在台上泣千古 ● 陈子昂
- 150/ 鹿门幽人 ● 孟浩然
- 155/ 艺术囚徒 ● 王维
- 160/ 秦时明月汉时关 ● 高适与岑参
- 166/ 兴高而采烈 ● 李白
- 170/ 一个人如何成为诗圣 ● 杜甫
- 174/ 长安花 ● 白居易、元稹
- 182/ 永州之野产异文 ● 柳宗元
- 186/ 百年老鸱成木魅 ● 李贺
- 190/ 无限夕阳 ● 李商隐、杜牧
- 196/ 有人楼上愁 ● 唐人词
- 202/ 花开花落 ● 五代词
- 210/ 天地词心 ● 北宋词
- 218/ 词歌·词诗·词论 ● 柳永、苏轼与辛弃疾
- 230/ 醉翁与他的亭 ● 欧阳修
- 237/ 缥缈孤鸿 ● 赤壁赋
- 246/ 菊花与刀 ● 李清照
- 250/ 野唱 ● 元散曲
- 258/ 浪子伟人 ● 关汉卿
- 264/ 豪杰之文 ● 李贽
- 269/ 不紧要之文 ● 袁宏道
- 275/ 民间的三国 ● 《三国演义》
- 282/ 快意恩仇 ● 《水浒传》
- 289/ 换一种读法 ● 《西游记》
- 296/ 欲与死 ● 《金瓶梅》
- 303/ 拍案叹世 ● 三言二拍
- 309/ 人为什么堕落 ● 《儒林外史》
- 315/ 词坛谢幕 ● 纳兰性德
- 322/ 天下一聊斋 ● 《聊斋志异》
- 328/ 桐城好文章 ● 桐城派
- 334/ 中国悲剧 ● 《红楼梦》
- 341/ 后记

一个民族的情怀

●《诗经》

《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地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那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圣经》,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对“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也曾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如果说它是我们心灵史,那倒很准确。其实,文学史就是心灵史。它确是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它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教训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

一个问题是:《诗》本来就是诗。为什么成了“经”?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释,当然可以予以说明。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远在汉

代,我们就把这样一部基本用四言韵文形式写成的、以抒情为主的、收录自那么广博的时空中的个性化的创作,与那些朝廷文诰、圣贤语录、哲学和史学著作,一同列为国家的经典?

从创作论上说,《诗》是“历史真实”的产物,也就是说,收集在这本古老经典中的三百零五首诗,都应该有一个创作背景,都是在特定历史事实的触发下创造出来的。

但是,它终究是诗,而不是历史。它们是经过心灵过滤的。它表达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创作者的“心理真实”。它是情绪,是情怀,是喜怒哀乐,而且,和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对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诗》终于成了“经”:它是个性的,却也是共性的,它是几千年前的某一些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体会,却也是几千年来直至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它是我们共同道德观的经典表达,是我们共同政治观的经典表达,还是我们共同人生体验的经典表达,一句话,它既是我们民族价值观的经典表达,也是我们民族博大情怀的经典表达。

因此,我们不从学术的角度,不从经学家的角度,我们从情感的角度去看《诗》,最后,我们会发现,它仍然是“经”!

是爱情之经,是亲情之经,是友情之经,是同情之经,是爱恨情仇之经,是喜怒哀乐之经。

还有更多的具体的问题纠缠着我们。这些美丽的诗篇从何而来?什么人创造了它们?什么人收集了它们?又是哪些人在几百年青灯古卷守护它们、琢磨它们,最后把它们聚拢成册,成为一本凝聚民族情怀的美丽经典?

什么是风雅颂?什么是赋比兴?这些至今仍活在我们的书面与心头的历久弥新的语汇,有着什么样的古老奥义?体现着我们民族的哪些思维特征?

当这本美丽的大书被编纂成册之后,它如何成为一个民族的核心记忆?一个民族是如何喜爱它,珍视它,代代传诵它,研读它,以此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并从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

是的,《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事实上,我们无论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的编辑成书、分类标准和意图,以及它所呈现出的艺术独特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是的,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不同见解而互不相能。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是全体的无能,从而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

这么得过且过，大家一齐装糊涂，往前捱日子。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诗经》既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十五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汝水一带全在其中，那么，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辽阔的空间，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收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汉书·食货志》，何休的《公羊传》注，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

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传》何休注）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大量记载《诗》的引用的《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五百多年，空间辽阔浩渺——那么，《诗》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是《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时候，如《大雅·板》、《大雅·荡》、《大雅·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大约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哪怕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

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但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抗战之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1946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应战。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大家一齐都躲起了。

但另一方面，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她，只为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为了解到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学术”地探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早就警告过的，“学术”在“美”这样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正如除非我们的联姻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考虑，我们爱一位美丽的女子并不一定看她的门第和背景。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正是没有学术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是否还能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

《诗》三百零五首诗中的每一首诗，都是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特定情怀的表现，是一个人的情感。但它感动了我们，感染了我们，让我们感怀万端。因此，它也成了我们整体的情感。

据《世说新语·文学》的记载，那个东晋名相谢安，曾问谢家的子弟们：《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后来淝水之战的主帅谢玄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这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诗经》中哪一篇最美？我一定回答说：《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憀兮。舒忧受兮。劳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

扑扑跳啊。)

我们可能只是无意中向窗外的月夜一瞥,却看见了如此美丽的一幕。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温暖、柔和,并不刺戳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她只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得预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

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一首诗,竟有如此的大圆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也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三百零五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个例子。《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过度学术化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历史何以成为散文(上)

●《左传》

我们把先秦记录历史大事,王朝政治,重要人物的行为、语言、思想、事迹及各诸侯国之间纷纷缠斗的政治、军事、外交诸多事件的著作,称之为历史著作,又因为它们同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我们又称之为历史散文。从记言的《尚书》到记事的《春秋》,从所谓“春秋三传”、《国语》到《战国策》,在先秦,史官随时笔录的枯燥的政府档案经过几个杰出人物的如椽巨笔,终于定格为彪炳千秋的史册,这些史学著作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史的记录,而且是那个时代哲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反映。其丰富的文化含量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元典,成为历代学子的必读书目。

《尚书》的“佶屈聱牙”我们可以放过,但孔子的《春秋》却有费点口舌的价值。“春”与“秋”为一年四季中的二季,春种秋收,春生秋杀,春秋代序为一个周期、一年,所以,“春秋”合称,就是指时间的运转。古代史最初的体例是编年的(按时间顺序依年编纂),故以“春秋”作为史著的通称。而《春秋》则特指据说为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此间的各国大事,都简要记录在其中了。

但这部记录二百四十二年大事的史书,文字却仅有一万六千多字,二百多年各诸侯国大事,其间纠结缠绕,勾心斗角,因果相联,人事相搅,多少复杂烦难,以一万六千余字当之,定须简洁而谨严,要言而不烦,一以当十。这就形成了《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者,言语简洁而精省也,大义者,内涵丰富且包孕着主观倾向性也。这对事对人之“主观倾向性”褒贬,又往往是暗示而非明宣的,此所谓

“《春秋》笔法”。《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显然孔子作《春秋》不仅为客观记叙史事，为后人索隐，更为表达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并以之矫正世道人心，故《春秋》微言之中，有褒贬在焉。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但用一万六千余字写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可以想见其疏略简陋，这不是语言的锤炼所能避免的。所以，实际上，《春秋》并不能真正完成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记录，它只是一部“历史提纲”。王安石更直接批评它是“断烂朝报”。从叙述事实角度看，它实际上没有叙事，因为它没有“叙”，只有“记”，它只记录事件的孤零零的结果，而无起因、发生、发展之过程，更遑论其间的诸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包括各类人物的不同作用。就对事件的评论看，它亦没有论事，因为它没有“论”，只是过分依赖、迷信语言的多义性、丰富性，滥用其模糊性，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增加无约束甚至无规则的随意联系，这给我们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增加了难度。如“王正月”之“王”，在与“正月”连用时增加了它所指的义项，使之具有“尊王”的意味，就有些勉强。再如同为弑君，有的记为“人”（如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有的则无此“人”（如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文公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有“人”者表示“少数人”，被弑之君罪不该死，而这“少数人”倒有弑君之罪；无“人”者表示“举国共杀之”，罪有应得。这样费琢磨，也不够明确。至于某些为尊亲者讳的用词，更值得商榷。如“践土之盟”时，晋文公为盟主，召集诸侯大会，也通知周天子到会，主弱臣强，天子竟被诸侯呼来唤去，形同被挟，实为周天子一大耻辱，但孔子记曰“天王狩于河阳”，用一“狩”字，为之遮丑，这样做，能否起到“尊王”的作用，还很难说，而这种做法，遮盖了历史真相，倒是真的。实为史家所不宜取也。

《春秋》既有这些叙事和论事上的不足和缺点，就须有人对之作阐释。被后人称之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就是传释《春秋》的著作。

这三部著作，《穀梁传》（鲁人穀梁赤作），《公羊传》（齐人公羊高作）乃是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的，是弥补《春秋》“论事”之不足，对《春秋》的“微言”作深文周纳的注释和阐释，有时不免穿凿附会，这两部著作实际上已不再是史学著作，而是政治学、伦理学著作。而《左传》则补《春秋》“叙事”之不足，史料既丰富多彩，格局又规模宏大（十九余万字），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都堪称一流。

《左传》原称《春秋左氏传》，若标点为《〈春秋〉左氏传》，可明白地看出它与《春秋》的关系：它是以《春秋》一万六千余字为经、为纲，而自己为传、为目，补叙其历史原委的著作。当然，两者之间也不能做到事事对应，《春秋》中的有些经文《左